

# 熊彼得論

Haberler 著

閻子桂譯

約塞夫·熊彼得 (Joseph A. Schumpeter) 是一切時代的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獲得這種稀有的頭銜——應記住凱因斯的名言：『好的經濟學家是最稀奇的人物』——全靠這一事實：他不僅是在經濟學的領域中有成就的經濟學家。他自己常說，一位經濟學家，如果他不同時是一位數學家，一位統計學家與最要緊的是一位史學家，便不配作爲經濟學家。他不但具備這一切，而且多於此。他具有百科全書的知識。經濟學史是他的專業，而且精通經濟史，制度史與一般的政治和社會史。他並未受過數學的特殊訓練。學會運算數字和代數對他並非易事，但他獲得了大量的數學知識。甚至數理經濟學家都認爲困難的數學分析，他都能瞭解並加以正確的說明。他不是統計專家，但他深刻理解統計推理的邏輯性與限制性。且能與新方法和新資料並進。他一生對社會關係的原理和社會哲學深感興趣。並對社會和政治哲學有極大的貢獻。

在這些領域中，有人比他高明。在經濟學中，有比他更精密的和更貫通的數學的理論家，有比他更有能力的統計學家，有比他更精通某一時代與某一題目的經濟學史家。但作爲一個綜合一切經濟部門的經濟學家與作爲一個博學的學者，熊彼得在當代的經濟學家中，保有一個無匹的地位。

熊彼得不但是一個偉大的學者和開創的思想家。他還是一個有魄力，有風趣和極多方面的人物。具有瞭解他人心懷與意見之非凡的能力。具有強烈的諷刺感，有時似乎走到犬儒主義的邊緣。並具有可驚的幽默感。這種幽默感深深的與道德的信念相結合。對朋友絕對忠心。對事物有強烈的愛與憎。就是他不喜歡某種的人物，他的憎惡也被他的仁慈心腸與寬宏大度所約束住。他對他的學生特別體諒。信託他與求教於他的人，常一定會得到他的幫助與忠告。他實在花費了過多的時間來指導與幫助學生。這批學生有有天才的，也有平凡的。

他是個動人的和有吸力的演說家，同時還是寫作的能手。他的講演與致詞永遠使人興奮，常含有新的觀念與動人的談鋒，永不會枯燥無味。無怪他是一位極能感召人的教師。

熊彼得於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在睡眠中，以腦溢血去世。差一個月，過六十七壽的生日。

## 一 童年與大學，一八八三——一九〇六

約西(Jozsi)——他的家人和朋友這樣叫他——於一八八三年二月一日生於奧國莫拉維亞(Moravia)省的垂師(Triesch)(現屬捷克斯拉夫)。他是布商(Alois)愛洛斯熊彼得和他太太耶哈娜(Johanna)的獨子。約西的母親於一八六一年七月生於維納牛斯達(Wiener-Neustadt,)一個距維也納三十哩的工業城市，她是醫生朱立葉格魯乃爾(Julius Grinner)的女兒。她的母親名朱立外德拉(Julie Wydra)。熊彼得父母的祖先不詳。只知他是住在奧匈帝國的幾種民族的混血的後裔。

一九〇一年熊彼得在維也納大學的法律系作學生。一九〇六年授法學博士。在維也納與多數歐陸的各大學，在法律系教授經濟學。如讀學位，經濟學與政治學是必修課。而且必需參加考試。

一十九世紀初，維也納是研究經濟學的中心。孟革(Menger)在熊彼入學前，已從實際工作退休，雖然直到一九〇二年維塞爾(Wieser)接替他，他才辭職。熊彼得不是孟革的學生。據說，他們只會面一兩次。

他初次認真的研究經濟，是在我們現在所謂統計研究會。(Seminar)該會為著名的經濟學史家和統計學家殷馬斯特尼格(K. Jh. V. Inamsternegg)與久瑞史克(Franz V. Juraschek)所指導。他也參加過為維塞爾與非立普維奇(E. V. Philippovich)所指導的研究會。當一九〇四年龐巴維克(Bohm Bawerk)辭掉財政部長。再過學者生活，到維也納大學作教授時，熊彼得也積極的參加過他所指導的研究會。其他著名的份子有他終生的朋友米塞斯(Ludwig V. Mises)與薩莫爾(Felix Somary)。有一批青年馬克思主義的參加，使研究會更加活潑，有時且引起爭論。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在奧國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後來成爲理論家與政治領袖。其中有鮑爾(Otto Bauer)傑出的理論家，辯證家，一九一八年後奧國社會主義者的有才智的領袖。一九一九年熊彼得的任命奧國財政部長，似乎出自鮑爾的主張。還有希爾斐丁(Rudolf Hilferding)著名的『財政資本論』的作者，曾兩次出任德國的財政部長。另外有李德爾(Emil Lederer)，其後在海登堡和柏林作教授。

，一九三四年，與約翰生（Alvin Johnson）共同創立紐約新社會學院研究部。熊彼得和李德爾是後半生的朋友。他似乎和希爾斐丁甚友善。

熊彼得的精通馬克思主義與熟悉歐陸的社會運動，並認識他們的領袖，使他的作品生色不少。這一點在他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一書中達於極點。此書孕育於大學的研究會中。

一位當時參加研究會的份子告訴本文的作者，當龐巴衛克與馬克思主義者熱烈辯論時，熊彼得以他的冷靜而科學的態度加以注意。在參加討論中，他的這種似乎遊戲的態度，在他早期的著作中表現的極強烈。（尤其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理論政治經濟的性質與內容）。而且保持終生。他的這種態度為許多不嚴肅的人或虛偽的形式主義者所誤解。與熊彼得有私交的龐巴衛克立刻認識了他的才能。於一九〇九年幫他謀取維也納大學講師的位置，並於同年得到扎諾爾維資（Czernowitz）大學政治經濟學講座的任命。要知道，這位最偉大的奧國經濟學家，永未得到他母校的講座地位，雖然在他於一九二五年最後離開他的祖國之前，有過許多的機會。

## 一一 早年的學者生活

於一九〇六年畢業後，熊彼得去英國住了幾個月，大半住在倫敦，有時到劍橋和牛津走走，在那裡他曾向馬先爾（Marshall）與愛幾渥斯（Edgeworth）致敬，一九〇七年他與喜維爾（Gladys Ricarde Seaver）小姐結婚（後於一九二〇年離婚）她是英格蘭教堂高級職員的女兒。同年熊彼得去埃及。他第一部著作的序言上，寫的日期是『一九〇八年三月一日於開羅』。一九〇八年末或一九〇九年初，他們返回維也納，秋季開始作扎諾爾維資大學的教授。扎諾爾維資是奧國最東的一省巴庫文納（Bukowina）的省會。此省一九一八年後屬於羅馬尼亞，一九三九年併於俄國，一九四一年復歸羅馬尼亞，現為俄國之一部。

扎諾爾維資真是在東方，哈佛大學的同事們後來聽到的熊彼得課外活動的故事，彷彿來自天方夜譚。在扎諾爾維資的兩

年似乎是很快樂的。許多奧國青年學者開始他們學術事業的這個大學，確實具有研究的空氣。著名的法學的社會原理的建立者愛利 (Eugen Ehrlich) 其是熊彼得的同事。他的名著，『法學的社會學之基本原理』，後譯成英文，在哈佛大學出版部出版。還有另一位著名的法學家皮士克 (Georg Petschek)，他於一九三九年到哈佛法學院任職。

一九一一年熊彼得被請到格拉茲 (Graz) 大學，格拉茲是奧國斯太瑞亞 (Styria) 省的省會，在維也納一百五十哩。他為皇家所任命。他是最年青的教授，是這個大學中惟一的經濟學家。他在工學院負責教經濟學。最初他教的課程很重，包括所有經濟學領域的東西。雖然如此，他還加授有趣的特別課程，如經濟的民主與社會階級的問題。

格拉茲悶熱的天氣，沒有扎諾爾維資那樣東方的魔力。在此，他永未感到舒適，愉快。但格拉茲距維也納只有三小時的火車路程，後幾年，他常去維也納。從一九一三到一九一四這一學年，熊彼得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作奧國的交換教授。他教授理論課程，一在社會科學班，一在研究會 (Seminar)。一九一四年三月，哥倫比亞授予名譽學位。恰在大戰爆發前，回到奧國。他於一九一八年離開格拉茲大學。到一九二一年正式離職。

從一九〇六年大學畢業到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熊彼得的著作是極豐富驚人的。尤其是如果你想到這點：在他這期間，他居住於不同文化的五個地方，隸屬於四個國家，三個大洲。據說在戰前的維也納和倫敦，他曾充分利用許多機會，來找生活的享受。更不用說機會更多的開羅與扎諾爾維資了。

一九〇六年出版了他的重要的論文『理論經濟學的數學方法』。一九〇八年他僅二十五歲時，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大書，『理論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與內容』。一九一二年出版了有名的『經濟發展的理論』。這兩本書立刻使他在經濟學界成名。『他永遠不是個開創者』同皮曹夫 (Spiehoff) 在一九五〇年他的熊彼得的傳略中說。他三十歲時，寫了本 Epochen der Dogmen-und Methodenschichte。這是一本深刻而成熟的作品，雖然只有專家才能賞識。

有一本小冊子是對他的 Dogmengeschichte 論文的補充，他討論社會科學的過去與將來。這本小冊子產自一九一二年在扎爾諾維資的講演，比 Dagmengeschichte 更簡短更通俗。他討論經濟學和社會學與哲學和歷史的關係。也談到有興趣的

技術經濟問題，在此預見到後來的發展。例如在一二五頁，熊彼得號召作經驗的，『特別是統計的』研究，來決定『需求曲線』的形狀。其後他每年寫許多重要的論文和無數的書評。

他的商業循環學說，最初在『經濟發展的理論』中有充分的說明。但在一九一〇年一篇論經濟恐慌的文章中已略具端倪。在『經濟發展的理論』的序文中，熊彼得說早在一九〇五年，已考慮到這些基本的觀念。他的有名的利益學說，清楚的略述在第一本書中，但到第二本書，才有充分的發揮。第一本書也含有儲蓄學說的有趣思想，其後再見於『商業循環』一書中。『儲蓄並非所得的函數』。（理論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與內容）人們很快的習於較高的所得。當他們的所得提高時，儲蓄並未實際增多。

熊彼得的社會學的基本見解最初見於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一篇論文中。其後完成於他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一書中。此書似乎早已在腦中具體化。在一九二七年的論文的序文中，他說：基本的觀念形成於一九一〇年。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一年的冬季在扎諾爾維資初次發揮於『國家與社會』的有系統的通俗講演中。一九四二年，由他的流傳很廣的論社會主義的著作，他對社會主義的見解始為英美大眾所熟知。其實這些意見早清楚的表現於一九一八年出版的 *Die Krise des Staatstaats* 小冊子中，一九一九年出版的 *Zur Soziologie der Imperialismen* 漢出的論文中，和在英奧兩國發表的兩篇談社會主義的文章中。

除特殊的內容外，熊彼得的一切著作，都具有幾種特徵：第一極愛好經濟學的數學方法。他終生重視在經濟學的研究中歷史知識的重要性。他常說，如果讓他在歷史或數學的訓練中必須放棄其一，他寧肯放棄後者，而取前者。

他雖熱心於數學方法，但很少用他。關於這方面，他恰與馬先爾相反。馬先爾有數學的才能和數學的訓練。如果不數學，他的理論的成就是不可能的。『他從未歸功於數學並將這種有功的工具隱藏出來』（熊彼得論馬先爾的『原理』）。熊彼得雖無數學的才能，但他稱讚數學的應用。他的熱心，使學生們完成了經濟學中數學方法的應用。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早期著作中所表現的兩種特質：他的觀念和表現形式。二者都是獨創的。

在離開大學的時期，他博覽了各種經濟著作，古典的與現代的，尤其是英文的。他最稱讚小瓦拉斯（里昂瓦拉斯——譯者）的著作。在他第一本著作的序言中，說瓦拉斯與維塞爾，他的教授之一，是使他感到親近的兩位經濟學家。但在其後的著作中，很少提到維塞爾。（雖然他寫過一篇美而短的死者略傳）。他一直很讚仰瓦拉斯。在他的論馬先爾的『原理』（一九四一）一文中，他稱瓦斯是『所有理論家中，最偉大的一個』。在他的經濟發展的原理日譯本（一九三七）的序文中，他說，『作爲一個經濟學家，瓦拉斯給他的影響比任何人都多』。

熊彼得常被認爲屬於奧國學派。其實作爲一個人和學者，他從最初便是一個世界公民。他從不愛將他自己隸屬於任何國家，團體或學派。『他不是任何人的學生』，他說孟革的話，也可應用於他自己。這種精神上的完全獨立，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已表現的很清楚。具體的說，這些著作很少表現特殊的『奧國影響』。在『理論政治經濟學的性質與內容』中，有一章論歸屬（Imputation）與他的成本學說或者可名之曰『奧國的』。但在許多其他的方面，他的見解在那時的維也納並不流行。在孟革與史慕勒（Schmoller）的方法論的論戰中，他拒絕站在任何一邊。雖然那時大戰仍在進行與空中尚充滿着火藥氣。數學的方法，在維也納並不甚流行。在第一本著作中所採取的反對『心理學方法』與用內省法之行爲主義的態度更是少見。維塞爾特別批評熊彼得的這些地方。值得一提的是熊彼得其後在這些方面也改變了他的觀點。在哈佛的理論課堂和私人談話中，他常用『心理的根據』，以內省法來辯護基本的功用。有時甚至認爲在個人之間可作效用的比較。

熊彼得無疑的受了龐巴衛克的資本學說的影響。在他的經濟發展的學說中，利用了迂迴生產方法的概念。但他予這方法以動態的傾向。他的利息學說完全與龐巴衛克的不同。

脫離環境影響之精神的獨立性，絕對不受經濟學和政治學之當下時髦的誘惑，精神的完全的自由，這一切（奇怪的是他對他人的思想之非凡的理解力，——他的傳記文字可作證明）便是顯著的特徵。不瞭解熊彼得的人常以爲他故意與衆不同，唱反調，以取得孤芳自賞的快樂。他有時爲了論戰的原故，常爲他所不相信的一種立場而辯護。他並不永遠愛居於少數。他的獨立並不是一種做作。他的態度正如尼采論叔本華：

Seht ihn nur an——

Niemandem war er untan

## 三 踏入政界與商界一九一九——一九二四

熊彼得將其大半生貢獻於思想，教育與著作中，雖然他從不是一個書呆子。他對政治與國際問題永感興趣。他從不遲疑發表他的政見。只當第一次大戰終了到一九二四年，他才第一次實際參加政治生活與商業界。

當大戰時他並未隱瞞他的和平主義，親西方（尤其親英）與反德的態度。在論賦稅國家的危急一本小冊子中，他不採用官方的用話，而用『爲自由與生存而戰』或諸如此類的話。他認大戰爲『嗜血狂』，徒使歐洲糜爛。從大學時代便與高等貴族有來往。他似乎參加過加爾（Karl）皇帝與宮庭集團所安排的奧國與西方單獨構和的企圖。這種企圖是流產了。

休戰後，德國社會主義政府，在柏林組織了一個社會化委員會，以研究與準備工業的國有化。該委員會的領袖爲卡爾考斯基（Karl Kautsky）。希爾斐丁與李德爾，是著名的委員。李德是熊彼得大學時代的舊相識。熊彼得被邀參加此委員會，在柏林自一九一八年冬至一九一九年初，他工作了兩三個月。這工作似乎像一種研究會，來討論社會化和其他的經濟問題。熊彼得的參加這社會化委員會，常用以證明他的相信社會主義。這是不正確的。這委員會並非全由社會主義者所組成。正如布魯克（Bruck）所示：『社會化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一八年，內有各種色彩的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其中有著名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如考斯基，李德爾與希爾斐丁。有自由主義者如福蘭克（Franke）與窩格爾斯坦（Vogelstein）。這個委員會有時與其他有聲望的思想家和實行家合作。在這種條件下，熊彼得教授參加了此委員會。

熊彼得在答覆一位青年經濟學家向他提出的問題時，表示了他的態度。一個稱讚企業家的任務與自由企業制度的效率的人，爲什麼參加社會化委員會，他的回答：『假設有人要實行自殺，最好叫醫生在場』。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奧國第一共和的議會成立。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派（正式的名稱：社會民主黨）爲第一

大黨。社會主義者與基督教社會黨（一個天主教的保守黨）建立了聯合政府。以右翼的社會主義者瑞納博士（Dr. Karl Renner）爲首。兩個政黨，沒有一個急於想負起責任來，解決出力不討好的奧國的無法解決的財政問題。於是兩黨同意請一位非政黨的專家來試圖解決此一棘手的問題。（二次大戰後，歷史又重演此事）。瑞納政府的外交部長鮑爾提議熊彼得作財政部長。三月十五日，熊彼得便遷入堂皇的巴魯克（baroque 流行於十七八世紀的一種建築形式——譯者）宮去。此宮爲奧國的最大的政治家尤琴（Eugene）所建。熊彼得的先生龐巴衛克，在更有利的條件下，曾任此職。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七日，他辭職。

離開政府兩年之後，熊彼得就了白德門銀行總經理之職。這是一家小的，歷史久，有信譽的私人銀行。此銀行後來不久在長期的恐慌中倒閉了。他於一九二四年破產，因爲他是第一家失敗的銀行，許多人破財——以後的年代，奧國對銀行破產已司空見慣，實事上，沒一家銀行幸免——白德門銀行的崩潰，是一個大打擊，陷總經理於困難地位。不像其他的銀行家，在破產中，他自己並未留下分文。其後的若干年，他以個人所得來還債。

他決定重過學者生活。受聘爲日本的客座教授。但他立刻從普魯士教育部長接聘了波昂（Bonn）大學的講座，未去日本。由於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狄則爾（Heinrich Dietzel）的退休，而出的缺。在他的晚年，他永未忘記日本與德國的大學會給他重過學者生活的機會。他對德日兩國的好感，與反對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兩國的人民和他們的文化之全部否定，實置根於那次的經驗。

在離維也納之前，他與一位美麗的維也納小姐瑞新格爾（Annie Reisinger）結了婚，她出身寒苦家庭。熊彼得會幫她求學。此次婚姻，美滿快樂，但爲時極短。一九二六年他太太因生產在波昂去世，在同年他所最敬愛的母親也病逝。兩人的死是一種可怕的打擊。從此後有一種消極與悲觀的氣氛，明白的表現於他的性格中。

## 四 在波恩與哈佛的學者生活一九二五——一九五〇

遷居於波恩，在各方面是與他過去生活的完全決裂。作爲一個典型的舊奧國（一九一四年以前）社會的人，熊彼得從未成爲德國的朋友和讚美者。雖然如此，在萊茵河上，一座有學術空氣的古老的大學城中，他不久便感到舒適愉快。他結識了一批新的終生密友。這並不是說他忘掉了老朋友。但他永未再回祖國。我不相信，其動機是由於怨恨或傷心。而是他決心放棄政治和商業生活，將全身奉獻於學術界之邏輯的結果。

從波昂轉到哈佛也不是突然的。一九二七到二八這一學年他在哈佛教書。一九三〇年的秋季又到哈佛。從波昂辭職，於一九三二年，回哈佛，永久住下去。到一九三五年，他在歐洲住了三個夏天，從未再去德國。

到哈佛第一年與陶西格（F. W. Taussig）住在一處。一九三七年與布德（Elizabeth Boody）小姐結婚。她是新英格蘭世家的後裔。她也是位經濟學家。在時光的推移中，他漸深的瞭解她的專心與在各種實際事務中給他的幫助。沒有她的愛情和知心的照顧，他不會有這樣大的成就。

他在哈佛時期，學術的成就是可驚的。第一便是那兩大卷『商業循環』（Business Cycles 1939）。副題說的好，『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之理論的，歷史的與統計的分析』。他是一部理論緊嚴，材料豐富與用力勤苦的巨著。此書的主要觀念與一般範圍，是盡人皆知，在此不談。其爲人所不知者是沒有書記，秘書的幫助，他單獨一人，寫成此書。雖然他是一個很社會化的人並贊許科學的集體研究。在他的研究工作中，熊彼得永遠是一個孤獨的人。他所出版的一切東西，都是用手寫的。他很久沒有秘書，甚至親手寫信。

他有迅速敏捷表現的奇才，龐巴衛克名之曰『上帝的贈品』，並說可能是種危險的贈品。他有閱讀和吸收新觀念之驚人的速度。當寫作和談話時，在德英豐富的字彙中選取適當的字眼，他從不感到困難。實際上，他運用英語的靈巧，很少人能趕上他。短期間，商業循環一書銷路是不佳的，其原因易於瞭解。這部書編排的不太好，而且不易讀。此書以莊重和含蓄的筆法寫出，並未注意到讀者或流行的風尚。他出版於戰爭開始時，那時凱因斯主義與衰落（depression）經濟學正在他的高潮。除掉這種不利的外部環境，這類的書需要相當的時間來充分發揮他的影響。

第二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是部嚴肅的書，不是教本）是很成功的。他印行了幾版，最低譯成了五國文字。他是在一兩年內寫成的，作者以為最多不過是本次要的著作。

在晚年熊彼得從事於經濟分析的歷史。這部稿子差一點未完成，將由熊太太出版。書共兩卷，名『經濟分析的歷史』。

此外，他還寫了許多文章，其中有論陶西格，馬先爾，凱因斯，費沙（Fisher），柏萊圖（Pareto）和米其爾（Mitchell）等傳記傑作。這些文章和早期的論瓦拉斯、孟革、龐巴衛克，和馬克思（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的第一編）合編一冊名『十大經濟學家』從馬克思到凱因斯，不久將由牛津大學出版部出版。

所有在哈佛的時期（除掉兩次休假時期在家工作外）熊彼得擔任全部的教學工作，尤其是在早期，他組織並出席各種的討論會與研究會。他常覺得大學的教學工作太重，以致教授沒適當的時間來從他研究與寫作。並堅決要求減少。但他本人常擔任的比規定的尙多。這真是：他為他人求酒，而自己喝水。

熊彼得是個最好處的同事。他常愛援助他人，為公家服務，或為不能工作的同事代課。但最不願求別人幫忙。他以為大學教授和學者應有最高的尊嚴與社會地位。他常抱怨在多數美國的大學中與一般的美國社會上，學者並未得到他們應得的社會地位。並負擔了過量的行政事務。雖然如此，他仍與年青的助教們共同作些低級的雜工，例如外國語考試等。他永不擺要人的架子，雖然人們以為他是要人，尤其是局外的人。

他每年所教的功課包括高級理論的全課程。每二年講授商業循環半個課程與經濟思想史一個課程，有時貨幣與銀行半個課程。近年來每年他講授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半個課程。這些課程的內容每年不同。但都有一個缺點：聽他的講演與讀他所指定參考書的學生，永遠看不到熊彼得本人關於這些題目所寫的任何東西。

## 五 熊彼得對經濟學的貢獻

對熊彼得的學術成就與他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全面的與詳細的評價，時機尚未成熟。對於如此巨大而複雜的工作之評價需要較長的時間作適當的透視。特別是他最後的大著，經濟分析史尚未出版。此書可預期為經濟思想史上的大事件。下面的評論只是初步的大綱。

在龐巴衛克傳的開端，他指明龐巴衛克的全部科學工作是一個渾然的整體。實際上龐巴衛克所寫的一切是向着一個明確的目標。此目標為研究出他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範型（model）。他的無數的論戰，其惟一的目的在闡明與支持龐巴衛克自己理論的機構。『他確切的知道在科學與生活中他所需的東西。所以很容易評論他的著作』（熊彼得）

熊彼得自己的著作很難評述。他在近代經濟學中的地位不易確定。這有幾種理由。熊彼得與龐巴衛克和多數偉大的社會科學家（愛幾涅斯可視為例外）一樣，對社會——經濟的過程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像一齣好劇的結構一樣，有其統一性。他的『偉大設計』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性質與內容』一九〇八）中已具輪廓，充分發展於他的『經濟發展的原理』中。在他的『商業循環』中，勤苦的加以說明與考驗。在他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中則更加成熟了。他比龐巴衛克與其他新古典派經濟學家更複雜的多。

第一龐巴衛克的範型（瓦拉斯的也如此，馬先爾的不然）本質上是靜態的。熊彼得的範型是動態的性質。他不是現代順序分析的動態。他不是個體動態（Micro-hynamics）。此處所謂『個體』不是指與總量（Aggregate quantities）相對的最小的經濟單位（家庭與商店）的行為。熊彼得是在後一意義之下的『個體』『理論家』（Micro-theorist），最低限度他的方法論的信念是如此。他常是懷疑總合與平均——『注意平均』在他的第一篇文章，中說——並常力說經濟的分析應基於家庭與商店。但在他的『理論的實際』（Theoretical practice）中，他與其他的經濟家意見相同，不可免的利用總合與平均。此處所謂『個體』是指次要的，不重要的意義而言。熊彼得的學說不是『個體』動態如近來後期凱因斯（Post-keynesian）主義者的乘數加速範型（Multiplier-acceleration）那樣。他十分熟習那類的範型。他極稱許那些範型中的數學技巧，在他的課堂上相當詳細的加以討論。並愛有限度的利用他們來說明在經濟發展的大浪潮中之小的波動。但他覺得他們之不能說明大的經濟

律動 (rhythm) 恰似海風在海面所吹起的波紋之不能影響潮汐的律動一樣。

熊彼得的動態的機構和那種妄想的消費傾向與加速原理相比為更強大的力量所推動，這些力量的性質（技術與組織的革新，企業家的活動，與可使革新者從靜止的經濟的周流吸取生產資源的信用機構）為衆所週知，無須細談。

在他的『經濟發展的原理』的日譯本序文中，他說：『當我開始學經濟學時，我讀了瓦拉斯的概念與瓦拉斯的方法……我發現不但他是嚴格靜態的性質……但他也只能應用於不變的過程。不要將兩種東西弄混了。一種靜態的學說……在研究任何種的實際時，能够是有用的。所謂不變的過程便是實際上不改變，只是在時間過程中，以固定的生產率來從事再生產。假設有了變動，他是在外部的影響之下發生的，例如天災，戰爭等。瓦拉斯會承認此點。他會說（事實上，他確對我說過。這是惟一的一次機會我與他交談）……經濟生活本質上是被動的，只是適應加於他的自然和社會的影響。以此不變過程的學說構成理論經濟的全體……我相信這是極錯誤的。並相信在經濟組織的內部有一種力量能使經濟失去平衡。假設如此於是一定有一種變動的經濟學說。這種學說不僅靠外部的力量。……這正是我試圖建立的學說。我相信……他有助於瞭解……資本主義世界與說明許多現象……比瓦拉斯的或馬先爾的方法……更能滿意』。

我極懷疑這種經濟組織內部力量的作用與經濟組織外部力量的作用之嚴格劃分，對經濟發展之瞭解有任何的幫助。為熊彼得所描述和分析的經濟變動之具體機構無疑的構成對傳統的新古典派經濟學之一大進步。

在這幾方面，他本人覺得，與瓦拉斯，龐巴衛克，甚至與凱因斯相比，他更接近於馬克思。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他一生都為馬克思的偉大體系所吸引。雖然他決不是無批判的馬克思的贊美者。近年來他極反對，所謂『馬克思的凱因斯化』。即企圖以凱因斯的體系來解釋馬克思。熊彼得的體系還有兩個特點似乎使他與瓦拉斯，龐巴衛克與馬先爾相比，更接近於馬克思。第一他重視社會關係與社會制度（與純經濟的因素相對照）第二他重視歷史的趨勢。和他的學說之意向。

熊彼得與龐巴衛克和其他『純』經濟學家只有程度的不同。他不同情於含混的，幾乎玄學的『集體主義』，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含有極多的這種『集體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集體主義是『對整個的社會生活作特殊的和單獨的考察』。這

種考察假定社會的力量作用和影響個人的行為與獨立於個人活動的總合。熊彼得永遠固守他的『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即社會現象與力量必須用個人和他們的主觀和動機之間的相互關係與交互作用來解釋。

熊彼得不以龐巴衛克的學說——龐巴衛克在此又代表近代的理論經濟學——為『非社會的』，但『只是輕輕的觸及社會的組織』。應當注意，龐巴衛克清楚的劃分個人的家政經濟（魯賓遜經濟），競爭的價格經濟與中央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龐巴衛克與其他的邊際主義者很關心於經濟關係的分析。這種關係來自人類的慾望無窮，而資源有限，與特殊的社會組織無關。熊彼得不否認一般的規律性，但他以為遠比傳統經濟學所設想的狹溢。在這意義之下，他的學說是更『社會的』，即與龐巴衛克和其他們近代理論家相比，他更注意於社會組織。

關於利息，資本蓄積與商業循環等問題，其不同之點更顯著。在『經濟發展的原理』和他的與龐巴衛克關於利率的論戰中，熊彼得主張利率為制度與動態所決定。在靜止的或半靜止的價格經濟中或在中央計劃的（社會主義或一個家庭）經濟中，便無利率之存在。而龐巴衛克以為利率是屬於基本的經濟範疇，獨立於具體的社會和制度組織。在這一方面，多數的經濟學家，包括許多近代的社會主義者，同意龐巴衛克，認利率屬於計算或會計範疇，仍存在於社會主義的經濟中。

不要忽略了熊彼得對利率學說的貢獻不只限於某些可疑的命題，在靜止的條件下，利率等於零。他會承認在靜止的條件下，利率必定是正的。但會堅持利率在實際上，因動態的力量使其高於靜止水平。

利率之不同僅是整個問題之一面。熊彼得的思想系統與龐巴衛克（龐巴衛克在此又代表大部新古典派經濟學）的不同處是更深刻些。他是關於資本蓄積的過程和經濟發展的過程。

龐巴衛克與多數近代的經濟學家（特別包括 F. H. Knight 耐特）以為資本蓄積的過程（在本質上或者最低限度在其可能性上）是順利的進行。人民儲蓄並將儲蓄投資。同時生產方法常改變，新發明時時有，以此生產隨時增加。於是資本發展與生產增多。這批學者承認經過資本蓄積與技術進步的經濟發展過程時常中斷。也知道商業循環與經濟衰落一再發生。這些現象只是一種非本質的偏差。這種偏差由於貨幣的不穩定與諸如此類的原因而發生。這種不穩定是能够避免的，或者以適當

的政策可以使其減低到最低限度。

熊彼得不會否認某些進步，可經過資本的蓄積與技術的改良順利的實現。這種情形不太多。形成經濟發展過程的大變動不會逐漸的繼續進行，必定經過強迫的推動。許多其他的商業循環為貨幣的表面現象（可免除的貨幣政策的錯誤（米塞斯Mises, 哈葉克 Hayek））所招致。或由於停滯與摩擦（霍曲萊 Hawtrey）或由於乘數定律與加速原理。熊彼得以商業循環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之重要部分。產生這種結果的複雜機構與他的構成部分，革新者企業家與其他模仿者的開創任務，生產性的通貨膨脹與由強迫儲蓄而來的通貨收縮的作用等，是盡人皆知的。熊彼得對資本主義的概念比龐巴衛克和多數的新古典派經濟學家的更狹隘。他與個人主義的價格經濟不同，與大規模利用資本的經濟更不同。他是一種很特殊的價格經濟。即在這種經濟組織中，上述的有節奏的機構可以活動。『資本主義』有三個特徵……生產方法的私有。私有利潤與私人負責損失。私人銀行創造支付工具：銀行支票與存款。頭兩個特徵足以規定私人企業（如無第三個便不能滿意的規定資本主義的概念）。（熊彼得戰後的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的蛻變學說中，在更高的水平上，又見到社會的與經濟的力量之綜錯的交互作用。這種學說萌芽於早期的著作，完成於他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熊彼得見到資本主義制度誠大有功於人類。他曾大量提高了生產與生活水準。所得的極度不平等，不用嚴重的傷害經濟的組織便可輕輕的移去。他看不出有什麼經濟的理由為什麼資本主義在將來不能繼續發展下去。但他同時又相信資本主義注定的要滅亡。恰因為他的成功非摧毀他的社會構造不可。這項社會動力的見解，不為大家所接受，而且似乎也不是熊彼得的理論系統之必然的結論。但他却清楚的表現經濟的與社會的力量之極大的複雜性與其密切的相互關係。這一點是熊彼得著作的最大特點。

有人說熊彼得的學說比龐巴衛克與多數近代的經濟學家更歷史化。熊彼得對歷史問題常深感興趣。在理解社會與經濟現象時更注重歷史的方法。他有史感與史識。他的許多著多都有歷史的偏好。他的『性質與內容』（一九〇八）和經濟發展的原理（一九一二）兩書都是非歷史的。雖然在後一本書中所闡明的學說是後來對各種歷史詮釋的基礎。熊彼得不是在黑格

爾與馬克思的意義之下的歷史主義者。即他不主張一般的歷史定律。雖然他也利用決定論的歷史進化的觀點。並很迷戀馬克思的歷史哲學。他對正確方法的熱心與嚴格的科學訓練，不允許他朝着歷史——哲學的研究方向走的大遠。他以為歷史唯物論有許多真理。經濟的因素可以說明許多歷史過程，但不是全部。一種可接受的『歷史哲學』必須『留給領導集團與在特殊情形下（他指共產黨的俄國）領導的個人（史大林）以適當的位置』。

這便是熊彼得的社會——經濟現實世界寫照的輪廓。誠然是一副很複雜的圖畫。基本觀念於早期形成，但在以後的許多著作中才得以完成，處處加以修正。並以歷史的事實來證驗其學說。與龐巴衛克不同，他從不激烈的為他的學說而辯護。熊彼得（又與龐巴衛克不同，他甚稱讚龐巴衛克的克己和節制的修養）花費許多的精力於與他的主要工作無關於領域和題目。事實上，他對經濟學的每一部門都深感興趣。而且精通。幾乎對每門都有重要的貢獻。

他的第一本著作，尤其是早期的許多論文，其理論都是靜態的。在他的『*Das Sozialprodukt und die Rechenpfennige*』（1917）有名的論文中，他對貨幣學說，有極重要的貢獻。就動態方面看，貨幣信用與銀行的學說是他的經濟發展的學說之重要部分。並在許多論文中有多細的論述。在將出版的『經濟分析的歷史』中有兩大章論『貨幣信用與商業循環』。他還有社會學的著作，主要的是社會階級（一九二七），帝國主義（一九一九）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這都與他的基本範型有密切的關聯。但在幾方面，遠超出該範型範圍之外。此外有他的傳記論文與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其結果是遺著『經濟分析的歷史』。仍與龐巴衛克不同，他不但研究其他經濟學家的著作和與他自己的體系直接或間接有關關係的其他理論體系。並試圖全面的瞭解其學說與其爲人。

熊彼得著作的廣闊與複雜正確的反映出其心智之廣闊與複雜。他瞭解每種學說，每種觀點，每種方法。並知道其中某些東西是正確的和有用的，同時也清楚的知道他們的缺點或限制。他是極無偏見的，看到每一問題的一切方面。他不是一個折衷主義者即是說不企圖調合根本不能調合的東西。也不胡亂的將原理與事實雜湊在一起。

我可舉幾個例來說明此點，他對純靜態的學說深感興趣，並愛好其精密的數學表現。自稱爲『理論的美食家』。（

theoretical gourmet) 雖然如此，他充分知道他的限度或者他所認為靜態學說的限度。他對於福利經濟學領域中獨佔的競爭之學說持非常批判的態度。他甚愛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但他對商業循環之某種計量經濟的分析甚不耐煩。他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力有極高的評價。對社會主義極不滿。同時他也知道資本主義文化的缺點。並用他自己的方法來證明社會主義能與民主主義共存。

熊彼得的思想之複雜性，分歧性和一般性是正確的瞭解他的爲人和著作之關鍵。這說明了他的著作之缺乏有系統的組織與整潔。這在他晚年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商業循環』一書中，表現的很清楚。在『商業循環』中，他試圖全面的來研究資本主義的過程。經常從他的腦海中湧現出來的豐富的觀念，對每一問題各方面之銳敏的認識，對每一觀點和方法之有限性的瞭解，使他很難對任何題目整潔的有系統的表現其見解。他常不能充分的綜合他的觀念。容易給人一種印象：在重大問題上，遲疑不決，甚至前後矛盾。

他的文體可說是『巴魯克』（見前註——譯者）式的。能適當的表現其思想的複雜構造。其特徵爲：句子長，片語多，形容確切，意義分明。他的文體的這些特點，在他的德文著作中最明顯，因爲德國文字宜於表達複雜的思想。

## 六 為什麼沒有『熊彼得學派』

我常自問爲什麼沒有熊彼得主義者，如同凱因斯主者，甚至龐巴衛克主義者與馬先爾主義者了。熊彼得有許多熱心推崇他的人和多數篤信他的學生：無論他在何處任教，他都吸引住學生中的精華。世界各地成百的經濟學家，都深受他的影響，但無熊彼得學派。

以外部的環境來解釋此點似乎是合理的：比起凱因斯來，熊彼得生於不幸的國土。這種比較最有意義因他與凱因斯（一八八三——一九四六）恰是同時代的人。熊彼得的祖國，奧匈帝國，當他的學術事業尚在開始時，便已解體了。新奧國未給他以學術成功的機會，在革命的前夕，他到了德國，又未給他以足夠的時間來生根。以形成一個學派而論，經過戰前和戰後

思想和情感上的不安，十八年中的七八年又耗費在安靜的哈佛避難所中。這種理由似乎是充分的。但我不相信這是正確的說明。不論外部條件對他的個性與人格之影響如何，——他一定是很大的——熊彼得的思想和著作之基本的，內在的結構對他未能形成學派這一事實提供更好的說明。

熊彼得思想體系的複雜性，一般性與庸性，使結晶化為熊彼得學派甚為困難。他說馬先爾的話——『不像米爾（Mill），他未說過某些問題已澈底解決，無須他本人或任何人再進步加以闡明』——也很適合於熊彼得他自己。『我從來不願說什麼東西是確定的。如果我有作用，那便是將門打開，而不是關起他來』。他在波昂對學生非正式作告別談說時這樣講。他這樣便阻止了自己的學說像凱因斯那樣建立為簡明的系統。為了形成學派，建立這種簡明的系統是必需的。尤其是，不像馬先爾與凱因斯，熊彼得天性不能『滿足讀者們的切望——一種既高尚又愉快的福因——同時又對起自己的良心』（熊彼得：馬先爾的原理）。他不能像馬先爾『從心理熱烈的同情社會主義的理想。同時又冷靜的對待社會主義者』。（同上）。他正好相反，他深惡社會主義者的理想。但認為他們的主義有許多真理。又與馬先爾和凱因斯不同，理智的好奇心使熊彼得研究經濟學。他不是爲了拯救貧苦人的苦痛與墮落，這種道德的考慮來研究他。

總之，沒有熊彼得學派的主要理由，是因爲他既不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計劃主義，或者任何什麼『主義』熱心的信徒。他是一位學者與知識分子。我看經濟學很難算爲科學，因爲在經濟學派的形成中，非科學的因素演一個極重要的任務。在純科學的領域中，熊彼得的沒偏見和能包容，缺乏爲任何特殊的學說而奮鬥的精神，他幾乎在每一種學說與方法中可發現有益和可接受的東西，這一切都阻止他形成熊彼得學派。

熊彼得自己意識到這一切。在波昂他對他的學生的告別演說中，他說：『我從未想建立一個熊彼得學派。沒有這一派，也不應當有這一派。……經濟學不是一種哲學而是科學。以此在我們的領域內，不應有『學派』。許多人爲這種態度所激怒。因爲在德國有半打經濟學家，以他們自己爲某『學派』之首領與爲光明而向黑暗奮鬥的戰士。爲這類的事而戰是無用的。人不應當爲非消滅不可的東西而鬭爭。與政治和商業不同。立刻的成功，對科學應是無關的……至於我，願受後世的判斷。』

這便是他的哲學，假設他的感情也是這樣嚴肅和消極，他便不會如此仁慈。事實上，他對於成功與成名很關心。雖然他很少表現，但常為失敗所苦。他很善笑，極能欣賞動聽的談話，美妙的故事，幽默的笑話。但他根本不是一個快樂的人。我想在他的痛苦和消極的深處，有一種鴻溝存在，即崇高和嚴肅的理想與仁慈和愛人的美德之間的鴻溝。他也知道此點。他羨慕那些——如功利主義者與偉多利亞時代的人，馬先爾與凱因斯——不為理想與感情的鴻溝所折磨的人們。那些人能對住自己的良心，同時又能安慰自己與別人。

X

X

X

X

H. Von Haberler (1900——) 是熊彼得的多年同事。和熊彼得一樣，受教育於維也納，現在哈佛任教。主要著作有：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935) 跟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1937)